

统文献与出土碑刻相结合,对宋代河南富氏家族的谱系、家族主要成员的宦历、迁徙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和考证,将富弼家族的起源、崛起、鼎盛、衰落历程一一展现。

此次会议,学者们围绕着“漆侠先生与历史学:纪念漆侠先生逝世十周年”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漆侠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史经验,将老一辈史学家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运用到历史学诸多研究领域。相信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会有更好更新的研究成果面世。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王晓龙、杜敬红)

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中国元史研究会牵头和倡议、安徽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和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0月8—11日在安徽阜阳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国元史学术界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专家50多人,大会共收到中外学者的学术研究论文40余篇,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国际关系、思想、文化、宗教、经济、社会、地理环境等多方面问题,体现了当前国内元史学术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与进展。

关于元代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研究。赵阮以本世纪以来(2000—2010)韩国蒙元史研究为题对韩国蒙元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概述。白玉东从一篇文书探讨了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段历史,认为文书片段是古维吾尔文献中的全新类型的一个样本,为进一步研究古维吾尔提供了一段全新的有价值的史料。屈文军主要通过元代翰林官员设置和翰林国史院设立的分析 and 考察,提出了元代翰林官员设置和翰林国史院设立不能完全看作是元世祖行汉法的产物;元代翰林院制度中,有诸多蒙古旧制的因素;元代翰林国史院政治功能式微,根源在于皇权的加强;在古代翰林院制度史上,元代可谓是一转折时期。张岱玉对《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所记载的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史事进行了考察,认为蒙古军都万户府的设置体现了蒙古贵族确保“国族”——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和蒙古族地位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歧视思想与国策;札剌亦儿贵族在元一代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元朝蒙古贵族非常遵从成吉思汗统撒札和蒙古传统是蒙古文化的重要内涵。李德楠在复原元明时期政区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鲁西北地区行政区划紊乱的原因。研究发现:明代鲁西北地区不合理政区格局的形成,时间上可上溯至元代,直接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统县政区的设置。武波则分析了元代官吏黜降法。

幽王出伯家族史引起学术界的较多关注是近年之事,与敦煌、黑水城等地相关文献的出土与公刊息息相关。杨富学、张海娟结合传统文献与新出土文献探讨了幽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

义兵是元朝后期主要由地方富豪招募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为了更好地控制利用这部分军队,元廷将一部分重要的义兵直接视为官军,对首要人物授以地方军、政大权。对一般“义兵”组织,则普遍建立“义军”军府。王晓欣、薛磊的文章主要辑存了45方元代义兵官印,包括一方颍州等处义兵上百户印,认为这些义兵官印反映出元代淮河流域是农民起义的重要发源地,元廷与农民起义军在此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还有的学者对元代与政治、军事、外交有关的人和事加以研究。

元顺帝曾有避乱济州岛的企图。然而此事不见于《元史》及元代其他史料。近年来,一些研究韩国史的学者提到过这条材料,但没有进行具体分析。李岭考察了元顺帝曾有过的避乱济州岛的企图,认为确有其事。文章推测决策时间大致是在至正二十五、二十六年之交(1365—1366)。

张珪是元朝名臣。马晓林比较分析了《中书平章政事蔡国张公墓志铭》的两个版本。结合元中后期政治背景,梳理出该墓志铭文本的流传情况,勾勒出张氏家族在元中后期的命运。张帆探讨了顾瑛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认为顾瑛既忠于元朝,也对张士诚政权具有好感,并同张士诚政权的多名高官保持着往来,也正因为这一点,随着张士诚政权的灭亡,决定了顾瑛难逃明朝新政权的严厉打击,终于被逐出家园,魂断他乡。毛海明对史天泽的子侄史彬事迹进行了钩沉,围绕史彬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

奇后完者忽都作为元顺帝的皇后,一直是位争议颇多的人物。舒健探讨了奇后与元末丽元关系,认为奇后身逢元末乱世,政局动荡,对元后期的政治多有染指;又为高丽女子,在后期的丽元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文章也对David M. Robinson教授所著的*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一书中的丽元关系的论断做出相关评价,并认为Robinson教授显然夸大了奇后的作用。

关于元代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研究。申万里对元代乡试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并指出元代考试试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元朝乡试体现出“优待国人”的特点,这是元朝乡试体现出的民族统治的特色。张丹丹、刘海威从《元史·五行志》所载一段童谣和著名的“西江月”词分析了元代谶语及其反映的社会思潮。从民俗学、原始宗教学、语言传播学层面对元季社会思潮之谣谚、谶语、日者巫术与秘密宗教加以梳理、解释与分析,对深化晚元民变这一武装形式的结胎、崛起、发展以及区域势力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解读价值。王晓清认为晚元民变领袖大力宣扬谣谶,以为自己为天命所归而提升其合法性、正统性、神圣性、神秘性,以口耳传唱方式传播这一类型的童谣、俚语、符命、图谶。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集聚了反抗元朝政府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为大规模的起义与抗争奠定了舆论基础。

元代大都有关宫殿也是此次学者考察的一个方面。张冰冰通过考察隆福宫、兴对宫的沿革、建制、佛事活动、发生于二宫的重大事件,寻绎有元一代宫廷生活的一个侧面。

也有的文章对元代与思想、文化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探讨。在元代对维兀字的传承、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莫过于国师孛思吉斡节儿。王风雷对国师孛思吉斡节儿在蒙古文化教育方面贡献进行了研究。韩志远通过元末徽州名儒郑玉的成长经历阐述了作为新一代的南人儒士与元初遗民的不同之处,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了经过宋元易代之后,南人儒士逐步对元朝有了认同感。

邯郸市曲周县近年新出土有元代诺怀墓志。朱建路介绍了墓主诺怀的姓氏、籍贯、职官、先世职官及生平事迹。特木勒从王良的生卒年具体考证、对其前辈和后裔的梳理、所任最早官职详细信息的揭示、所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详细经历等方面对《元史·王良传》进行了订补。《淮安金石录》(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收录了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第一山的宋、元、明、清各代摩崖题刻,其中有元人余阙的题诗两件(拓影及录文,录文略有误处)是余阙行世《青阳先生文集》中未收的佚诗。杨晓春认为两诗作为书家余阙存世不多的书法作品,反映了他早年的书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杨维桢是元代后期东南,尤其是浙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文人,有关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文学史和美术史的考察中。向珊指出,杨维桢年近半百时作的《三史正统辨》虽未被朝廷采纳,却为他赢得了南方士人的普遍尊敬,文章还对杨维桢晚年的冠服进行了考察。陈颖是元末广东东莞人,《均赋役记》是他为至正间东莞县尹杨大举而撰写的一篇记文。陈广恩指出在岭南文献汇编中,屈大均的《广东文选》和温汝能的《粤东文海》是比较重要的两部记载《均赋役记》的书,但二书均以陈颖为宋人,这是错误的。另外,这篇记文对研究这两个历史人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时记文对研究元末广东地方社会经济状况也有意义。

关于元代经济史、地理环境变迁影响以及与之有关灾害史的研究。元明社会演化和南北差异整合发展等是近年学术界讨论逐渐深入的问题。李治安的文章认为,有元一代,赋役制度基本是南北异制;明卫所军户制、均工夫役制、户帖制同样是起步于江南,后又在户帖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详密的黄册制度,它们共同汇成了明前期驱民以供役的“配户当差”户役法;朱元璋抑富迁富政策动摇和部分改变了南朝以来近千年江南相沿未变的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与北方相差不大的“配户当差”户役法;一破一立,导致江南社会经济结构蜕变。吴海涛探讨了自唐朝至清朝间淮北地区纺织业的盛衰演变及其原因。

苗冬探讨了元代芍陂地区屯田,指出芍陂屯田继承了前代的良好基础,规模很大,管理严格,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芍陂屯田因带有较浓重的军事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元代沿海漕运事业较前代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为此元朝廷设置了海道都漕运万户府。陈波的文章探讨了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人事格局变迁,还梳理了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人事安排情况,对朱清、张瑄伏诛之后元代海运体制的发展趋向及其特点进行了探讨。

研讨会还涉及到地理环境变迁的影响、地名考证以及与此有关的灾害史等的研究问题。周运中探讨了方国珍崛起的浙东沿海地理环境变迁史。元会通河的开挖与南四湖的形成有较大的关系。王云探讨了南四湖的形成过程。合刺温山地名出现在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史料中,学者们的考证结果不尽相同。魏曙光考证了合刺温山的位置所在。有元一代,灾荒十分严重,危害之大很惊人。于文善以《救荒活民类要》为中心探讨了元代的灾荒及灾荒赈济。任崇岳、薄音湖的文章论及了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葛仁考的文章论及了元代滹沱河的灾害及治理。

综观此次学术讨论会,从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来看有国内元史学术界著名的专家、学者。从会议学者提交的论文来看,涉及到元代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有元代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元代经济史、地理环境变迁影响以及与之有关灾害史的研究等等,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阜阳师范学院 吴海涛、于文善)